

息滞后现象现在已经得到根本改变。学术访问、会议讨论、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使我们已经融进了国际学术共同体之中。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了一大批熟悉中外文学理论而且在研究方面造诣颇深的学者,形成了进行理论自我建构的人才储备和知识储备。因此,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尽管道路可能是漫长的,但未来必定是乐观的。

深入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论,需要坚持正确的态度,既不挟洋自重,唯我独尊,也不缺乏信心,妄自菲薄,而是要正本清源,鉴往知来,吸收精华,去其糟粕,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外国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拿来,舍此便是本末倒置^[5]。陈众议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好,可以用来结束我这篇小文:“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

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6]的确如此,只要我们坚持吸收优秀的外国文学理论研究成果,坚持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建构中国的文学理论是大有可为的。

[参考文献]

- [1]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5).
- [2] 聂珍钊.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1).
- [3]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1).
- [4] 张江. 强制阐释论[J]. 文学评论, 2014(6).
- [5] 陈众议. 当前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5(2).
- [6] 陈众议.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系列总序[J]. 东吴学术, 2011(2).

[责任编辑:张树武]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6.003

本位、外位与外国文学研究

——关于当代外国文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吴晓都

外国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已经走过了百余年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新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焕然一新,成就斐然。改革开放后,新时期开启了外国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更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学术资源愈加丰厚,文化视野更为宽广,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近四十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新世纪伊始,外国文学研究界对本学的创新发展与建构充满期待。

在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和社会科学研究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期中,如何进一步建设好外国文学研究学科,推动学科朝着更加充满活力的文化空间发展,值得当代外国文学研究者倾力思考。

一、文化自信与外国文学研究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我们具有接受和吸纳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宽厚的文化平台。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 95

[收稿日期] 2016-06-22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 吴晓都(1960—),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俄友好协会理事,首席研究员。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新世纪的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在了解、吸收、借鉴和研究外国文学的过程中，特别需要的正是这种文化自信。而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先驱者及其后继者们正是站在这样坚实的自信的文化平台上发现和“拿来”外国文学的。他们放出眼光，主动拿来了近代先进的外国文学资源。众所周知，鲁迅就是满怀文化自信面对世界文学的楷模。

记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外国文学研究迎来科学的春天之时，茅盾先生就呼吁外国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仍然要“向鲁迅学习”。因为，鲁迅的“拿来主义”的立场，恰恰就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具有世界眼光和民族文化主体性大家的高度文化自信。“鲁迅对于中外古今的文学遗产，从不采取片面的极端的态度。他是辩证地看待它们的；他主张吸取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主张借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猛烈抨击当时所谓‘全盘西化’的谬论，并斥之为洋奴思想。但他对于西方文化、文学的优良部分，便热情地翻译和介绍。……我们在介绍世界文学工作方面向鲁迅学习，我以为就应当学习这些。”^{[1]10-11}茅盾先生学习鲁迅和继承发扬鲁迅传统的呼吁虽然是在近四十年前针对外国文学介绍与研究刚刚恢复而发出的，但对于我们今天深化和推进外国文学研究依然具有深刻的学科构建意义。这就是我们依然需要鲁迅那样的文化自信，我们依然需要鲁迅那样的辩证的方法论，我们依然需要鲁迅那样无限宽广的文化视野。

提倡文化自信就需要厘清如何理解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本位”问题，也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的主体问题。主体问题既是一个吸纳外来文化的立场问题，也是一个文化研究宗旨问题，即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究竟站在什么立场和位置上来审视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来看，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只能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上和文化基石上来吸取外国文学和外国文论的优秀资源，繁荣与发展我们的文学研究，探寻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

其实，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坚守文化发展的主体意识，坚持文化自信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

建设的题中之义，是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在谈到马克思的修辞风格时候指出：“马克思是一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他憎恨滥用外国字。尽管他一生有 2/3 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但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却发现多少独创的真正的德国文字的用词造句啊！他对德文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是德国韵文的最卓越的大师与创造者之一。”^{[2]333}李卜克内西对马克思的这个赞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者维护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正确立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化，只能是借鉴外来文化资源，丰富自己的学术研究，建设自己的文化，而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忘记本位，而被外来文化化掉。我们应该明白研究外国文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终究应该是为了发展和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学，为了创作自己民族的精品，为了给世界文学的发展提供优秀资源。

熟悉当代中外文论研究的学人都知道，钱钟书先生在俄罗斯现代文艺理论与中国古典诗话比较研究中，凭借深厚的中国文化涵养，充溢的文化自信，敏锐地发现中国古代诗人远比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理论家更早地掌握了“陌生化”诗学的法则，自豪地指出了中国古典诗人在同一诗学领域领悟中的领先地位。20 世纪早期与未来派关系密切的俄国先锋文艺理论的诗语研究会的学者代表什克洛夫斯基创立了所谓“陌生化”的艺术创作法则来对抗传统的艺术形象思维理论。即加深艺术文本的感知难度，使其语言陌生化，就是艺术创作的宗旨，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不同的根本所在就是反生活语言的陌生化。钱钟书先生将形式学派这种艺术法则概括为“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defamiliarization），或曰使文者野（rebarbarization）”但钱先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简单地介绍俄国这个当时的艺术新论，而是敏锐地指出，在中国宋朝文学家梅圣俞早就掌握了诗歌创作的这一重要规律。钱先生进一步指出，苏东坡的前辈梅圣俞早就有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诗歌创作理念，而且，中国古典诗人对于“陌生化”艺术法则的运用不止于语言构造的形式方面，而在“取材选境，亦复如是”，我们的古典诗学的相关理念是更丰富和全面。故而，在钱先生看来梅圣俞的总结概括早于俄国形式主义论宗近千年。完全可以说，中国古典诗人在这个诗学领域是“夙悟先觉”^{[3]32}。由此可见，我们在研究外国文

学和诗学的时候,应该坚持文化研究的主体性,秉持文化自信,通过平等的文化对话、交流,从而探索出各民族文学的共同规律。

而且,在对待外国文化学习和研究问题上,有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坚守文化本位立场的学者代表还可以提及鲁迅的大弟子,著名的散文作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曹靖华先生,曹老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常常教导自己的学生要学好母语。他谆谆告诫学生,外国文学翻译,就是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精准地找出对应母语的那些词句。如果不掌握好自己的母语,学好母语文化,这个起码的转换任务就难以完成。诚然,只有真正掌握母语文化,才会有充分的文化自信。

革命导师和前辈杰出学人坚持文化自信,刻意文化创新的范例,给我们当代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启示是,在关涉外国文化语境时候,坚守祖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本位立场,对于弘扬和创新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的意义。

二、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坚持主题思想与艺术形式并重

柏拉威尔在高度评价马克思的文学研究优点时特别强调:“马克思不常谈到形式问题。他在文学上的美学观点,像黑格尔一样,承认(Gehalt)第一,主题和思想第一;他在早年有句箴言:‘形式如果不是表达其内容的形式就没有任何价值’,这在他评论具体文学作品时仍然在他的思想深处经常起作用。这句箴言的含义是,一部作品要表达什么思想和她的表达方式必须协调一致。但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对于那些知道怎样使用缰绳但是没有马匹的艺术家,对于一切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对于用华丽的辞藻掩盖陈腐的思想、感情、甚至无知的‘美文学’感到厌烦。”^{[4]552}德国浪漫诗人梅林在谈到马克思的文学鉴赏方面也十分赞赏马克思重视作品思想价值的科学态度,他指出,马克思“绝不是那种常常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或甚至奴颜婢膝相联的‘纯粹美学’的信徒。在文学方面马克思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不能用任何死板公式来衡量的具有独到见解的学者。”^{[2]333}一个时期以来,外国文学介绍与研究中也确有一些重形式而轻思想主题的偏颇倾向客观存在,对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的文学研究传统的正确主张有所忽视与抛弃。实事求是地讲,在文学研究中注重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是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优良传统。世界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作家其实都是十分重视

作品的思想内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把长篇小说的“思想性”视为19世纪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属性。”^{[5]272-273}他盛赞维克多·雨果是当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文学中恢复“思想性”的主要预言家。雨果向来强调作品建构读者的灵魂,而思想恰恰是灵魂的核心。受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创作的影响,后来被鲁迅称赞的俄罗斯19世纪后期的小说大家安德烈耶夫也认为,“思想”应该成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欧洲进步文学重视文学创作的思想性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整个20世纪。苏联著名小说家、政论家爱伦堡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传统》一文中对在文学上片面专注形式而导致作品内容空洞的写作流弊深恶痛绝。他说,形式主义文学之风导致的最坏结果就是“只让作家掌握了空洞的形式”。因此,新世纪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应该避免重蹈20世纪被有觉悟的作家早已摒弃的文学研究中的覆辙。

三、“外位性”与外国文学研究

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一个传统和常态存在是由学习对象国语言的学者来从事该语种的文学研究。这种传统的优势是,由于长期学习和钻研对象国的语言,阅读和理解原著比较容易,第一手资料也容易掌握。但也正由于习惯对象国语言的阅读,易受该种语言文化的熏染和影响,从而在思维上陷入对象国的文化模式中而不能自拔。甚至有的研究者从不自觉到自觉地依附顺从这种思维定式,还自以为能够更切近地更深入地理解对象国的文化。针对外国文化(包括外国文学)研究这种认识上的思维误区,苏联文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就提出了著名的“外位性”研究法则。他指出,“存在着一种极为持久但却只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该融入其中,忘却自己的文化而用这别人文化的眼睛来看世界。这种观念,如我所说是片面的。……创造性的理解并不排斥自我,不排斥自我所处的时间位置,不排斥本民族文化,也不会忘掉任何东西。对于理解而言,重要的是理解者对于他要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事物所具有的‘外位性’,在时间、空间和文化方面的‘外位性’。”“只有他人,依靠他们在空间的外位性,依靠他是‘他人’的这种条件,才能看清和理解他的真实外表。”^{[6]353-354}巴赫金还指出:“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

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7]410-411} 由此观之，“外位性”法则也属于外国文学研究值得借鉴的重要研究方法论的范畴。克服巴赫金所提及的这种思维上的谬误，走出被对象国语言和文化牵引的习惯思维定式，摆脱已经定型的文学观念和评价结论，需要更多地引入“他者”的视角，当然，这就是杜甫所言的“转益多师是汝师”那种治学追求。外国文学研究需要研究者视野宽广地、跨文化地、多维度地阅读关于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当然，研究者能够多语种地涉猎原文的研究资料，是一种应当鼓励却也不易达到的更高的学术境界。钱钟书先生似乎就是深谙文化研究的“外位性”法则的大师。他的《管锥编》和《谈艺录》等跨文化的名著就是蕴含“外位性”思维的学术典范。如他关于“通感”、“圆”等文艺现象和文化概念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外位性”研究法则的出神入化地运用。外国文学里国别文学的研究不应再局限于原语种语境的讨论，研究者应当自觉的跳出原语种语境，首先从研究者本民族文化视角，同时运用兼容于“他者”的文化透镜来多方审视研究对象，以便得出更加全面，更加多维、多层的诗学意涵的解读。

四、世界文学的语境与外国文学研究

由18世纪歌德提出，经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丰富和发展的“世界文学”的文化发展格局理念到21世纪的国内外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界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当今的外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外国文学史的书写应当具有“世界文学”语境下写作的学术自觉。“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语）^{[8]255} 其实就是当代倡导的跨文化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思想先导。这里蕴含着对世界整体文化观照的综合比较整合理念。换言之，今天任何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都不应该再是“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语）。因而，任何外国文学的研究都应该是在世界文学整体语境下的自觉的比较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史的书写。外国文学的研究首先就会涉及外国文学的翻译，而钱钟书先生曾经有言：文学翻译就是比较文学。那么这种高质量的翻译在深入钻研翻译对象的前提下进行，翻译已然成为研究。这无疑就强化了符合严复“信达雅”高质量的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但文学翻译早就不只是单纯运用字典和词典就可以完美地完成的文化职业。文学翻译首先要建筑在理解外国文化的基础上，

同时还必须真正掌握本民族语言的精髓。其实，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相类似，从现象观察至转化为纸上的文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外国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关系极为密切，而今，外国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学科的两种表达。比如，有的学者就把鲁迅的外国文学研究看作是比较文学，将先生的《摩罗诗力说》奉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9]56-57}。那么，外国文学研究应该从比较文学中汲取哪些有益的成分呢？首先是现代人文的全球化的文化视野。对待任何一种国别文学，都不应该是孤立封闭的，多元文化的开放意识和自觉比较的意识非常重要。

同时，在运用世界文学的概念时，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语境内涵有着更准确的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概念，绝没有否定民族文学本身的存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当世界市场形成以后，“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8]255}，而民族文化的精髓和优秀成分却无疑会保留下来并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平台上依然顽强呈现，而这时，并没有抽象的世界文学呈现，“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8]255}，这也可以理解为，像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当代外国文学史的书写既要有世界文学的整体文化语境体现，又应该有民族文学的特色呈现，即在世界文学语境的大背景下揭示和彰显国别文学的独特风采。

[参考文献]

- [1] 茅盾. 向鲁迅学习: 鲁迅与外国文学[M].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2.
- [2] 陆梅林.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3] 钱钟书. 谈艺录(补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4] 柏拉威尔. 马克思与世界文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 [5] 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科. 文学论文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 [6] 巴赫金. 语言创作美学[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79.
- [7] 巴赫金全集: 第4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9] 乐黛云, 等.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责任编辑: 张树武]